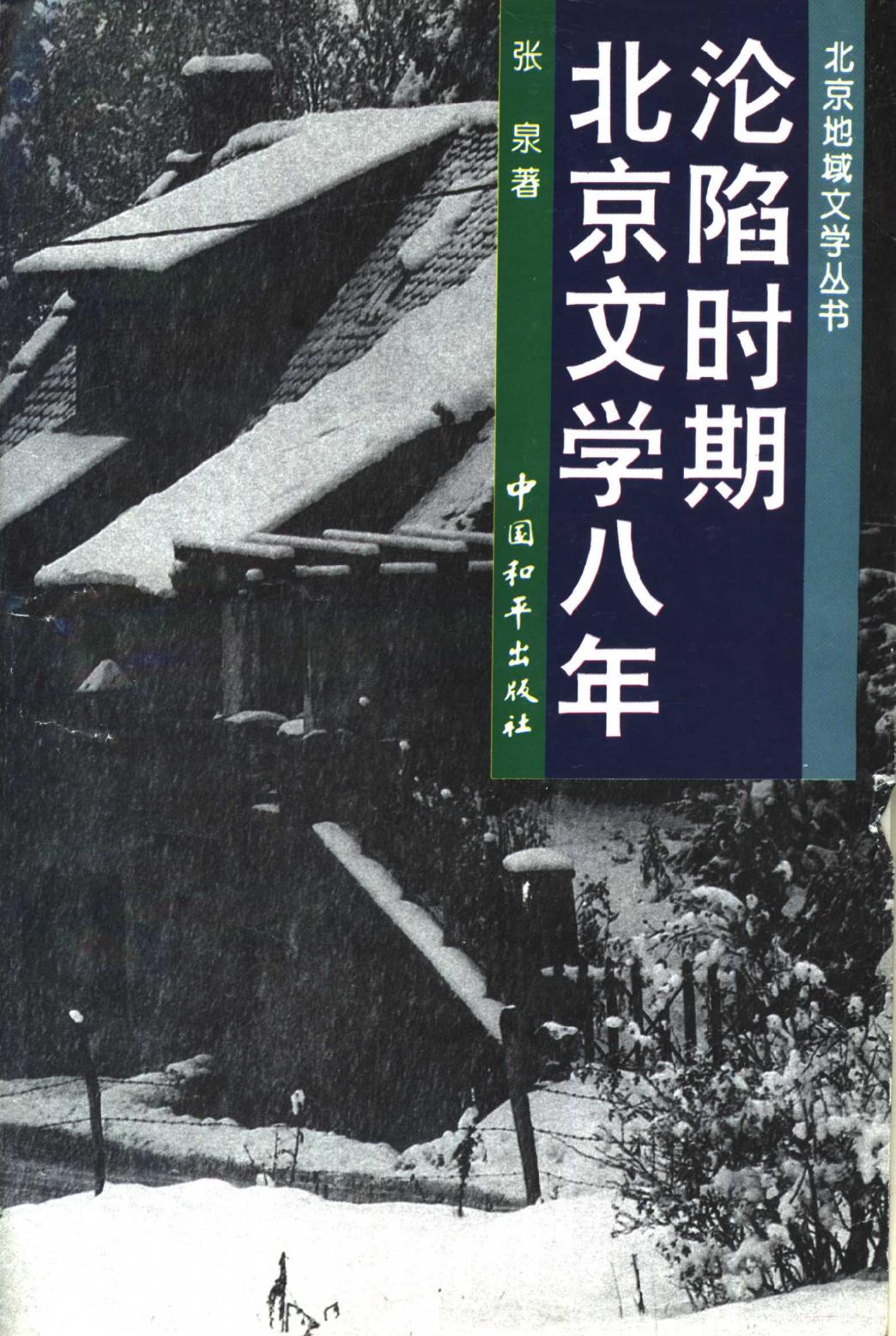


北京地域文学丛书

沦陷时期 北京文学八年

张泉著

中国和平出版社



沦陷时期北京文学八年

张 泉 著

中国和平出版社

(京)新登字086号

沦陷时期北京文学八年

张泉著

*

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发行

(100037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8号)

中国中医研究院印刷厂印刷 北京新华书店经销

1994年10月第1版 1994年10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2.65

字数：350千字

ISBN 7—80101—146—5/I·8 定价：11.50元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沦陷时期北京文学的多维参照 (4)

——苏联反法西斯文学——法国等欧洲国家沦陷时期文学

——海外对中国抗战文学和沦陷区文学的评价——中国抗战时期文学的多样性——形成多样性的原因

第二节 北京沦陷区文学研究的框架和要点 (11)

社会背景——文学的基本特征——辨析原始资料的意义

——出版物概况——作家的自然群落和社会群落——主要文学样式鸟瞰——虚有其表的散文兴旺——曲高和寡的诗歌

——演出压倒剧作的话剧——繁荣的小说——小说的发展脉络——乡土小说及其意义——小说样式和表现手法的多样性

第二章 日伪对中国文艺的政治介入

第一节 法西斯思想控制和奴化宣传措施 (25)

军国主义日本与纳粹德国比较——日本的“大陆思想战”

国策——伪政权的宣传运动和“中心思想”

第二节 日本当局方面与北京文坛 (30)

日本华北驻屯军代表龟谷利——日本国驻京使馆代表志

智嘉——日本文学报国会代表林房雄——《华文大阪每日》

第三节 大东亚文学 (42)

第一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第二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

——第三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

第四节 汉奸文学	(51)
基本特征——奖金征文抽样分析——短期专题征文——		
特定体裁长期征文		
第三章 北京文坛概观(上)		
第一节 相对超脱的校园出版物	(56)
燕京新闻——文艺——辅仁文苑——覆瓿——篱树——燕园集——燕京文学——文艺杂志——燕京水星——北大文学		
第二节 情况各异的民办刊物	(61)
沙漠画报——立言画刊——朔风——长城——华光——艺术与生活——三六九画报——学文月刊——吾友——读书青年——逸文		
第三节 形形色色的官办刊物	(72)
中国文艺——中国公论——新民报半月刊——改造——北京亚东道德月刊——新光杂志——东亚联盟——妇女杂志——国民杂志——北华月刊——新进——万人文库——华北作家月报——艺文杂志——文学集刊——敦邻——中国文学——创作连丛——中华周报——作家生活		
第四节 报纸及其文艺副刊	(97)
晨报——新民报——民众报——实报——新北京报		
第五节 文艺书籍的出版发行	(100)	
新民印书馆——华北文化书局(武德报社)——其他		
第四章 北京文坛概观(下)		
第一节 文艺社团及活动	(106)
青年作家协会——华北文艺协会——华北作家协会——沦陷区统一文学团体的筹组		
第二节 同人文艺社团	(115)
文园社——艺文社——在京日侨文学		
第三节 文艺口号的更迭演变	(123)
“建设文学”——“文艺复兴”——“和平文学”——“增产文学”——“国民文学”		
第四节 文艺论争	(132)

色情文学论战——关于乡土文学——木刻问题论战——

小说的内容与形式问题讨论

第五章 文坛名宿周作人

- | | | |
|-----|-------------------|-------|
| 第一节 | 堕入附逆的深渊..... | (150) |
| 第二节 | 与日伪文人的矛盾和冲突..... | (158) |
| 第三节 | 散文随笔创作概说..... | (166) |
| 第四节 | 对于日本的所谓“再认识”..... | (170) |
| 第五节 | 中国思想问题种种..... | (173) |

第六章 有名气的新进作家(上)

- | | | |
|--------------------------|-----------------------|-------|
| 第一节 | 袁犀：人类痛苦心灵的寂默体验者 | (180) |
| 表里不一造成的灵与肉的磨难——美丑善恶的现实主义 | | |
| 再现—— | 异常心态的多元探索 | |
| 第二节 | 梅娘：刚柔相济的独特女性视角 | (195) |
| 第三节 | 高深：污浊与贫病中的反讽与抗争 | (203) |
| 第四节 | 马骊：直面战乱中的农民厄运 | (213) |
| 第五节 | 关永吉：寓反抗于乡土的呐喊者 | (217) |

第七章 有名气的新进作家(下)

- | | | |
|--------------------------|-----------------------|-------|
| 第一节 | 雷妍：女人的怨艾与失落感的倾吐 | (225) |
| 第二节 | 黄军：飘泊者笔下的兵灾与田园 | (234) |
| 第三节 | 萧艾：旧京社会众生相的画师 | (241) |
| 第四节 | 山丁：来自白山黑水的浑厚乡风 | (245) |
| 第五节 | 其他作家 | (247) |
| 沙里——张金寿——何一鸿——穆穆——王石子——萧 | | |
| 菱——曹原——杨鲍——田秀峰——李木 | | |

第八章 重新执笔执教的作家学人

- | | | |
|-------------------|----------------|-------|
| 第一节 | 华北资深作家 | (258) |
| 闻国新——王朱——程心粉——江寄萍 | | |
| 第二节 | 高校青年教师作家 | (276) |
| 南星——麦静——李曼茵——林培志 | | |
| 第三节 | 旅京台湾作家 | (281) |

张深切——洪炎秋——张我军——钟理和	
第四节 “古城文学家”	(286)
钱稻孙——杨丙辰——朱肇洛——郑謇——陈绵——商	
鸿逵——赵荫棠——毕树棠——沈启无	
第五节 相对超脱的文化人	(294)
俞平伯——郭绍虞——常风——王森然——冰心——李	
霁野——凌叔华——胡絜青	
第六节 武侠小说和社会言情小说作家	(301)
通俗小说——白羽——赵焕亭——还珠楼主——郑证因	
——耿小的——陈慎言——刘云若——左笑鸿	
第九章 道路各异的校园作家	
第一节 毕基初:大无畏的抗战作家	(312)
《盔甲山》:意味深长的“绿林故事”——《山城》:“革命”+	
“恋爱”——散文;悲哀时代的个人情感雕像——新诗:从爱	
情到战斗——胜利之后:现实主义的深化	
第二节 张秀亚:纯情孤高与公教情结	(325)
第三节 吴兴华:异常早慧的新诗探索	(331)
第四节 林榕:散文与批评并重的多面手	(338)
第五节 查显琳:情与欲的恣肆宣泄	(342)
第六节 其他作家	(349)
李韵如和朱炳荪——赵宗濂——谢人堡——秦佩珩——	
汪玉岑——纪莹——婉君——白金——顾视——李滋	
第十章 结论及几点说明	(363)
注释	(368)
人名索引	(385)
后记	(396)

引言

沦陷初期，在故宫、北海、颐和园，作家冰心“只听见橐橐的军靴声、木履声。穿长褂和西服的中国人都羞得藏起来，恨得溜走了。”可接着又发现，“街市忽然繁荣起来了，尤其是米市大街、王府井大街，店面上安起了木门，挂上了布帘，无线电里在广播着“友邦”的音乐”。于是，在逃离北京后的1940年，她用诗一般的语言记述道：“我想起东京、神户，我想起大连、沈阳……北平也跟着大连、沈阳死去了，一个女神王后般美丽庄严的城市，在蹂躏侮辱之下，恹然死去了。”^①在正直善良的人们看来，沦入异族侵略者魔爪的城市又“相安无事”地运转起来，无异于它的死亡。然而本书却从文学的角度证明：城市虽然陷落了，但北京文学并没有死，北京人的心并没有死——从这个意义上说，北京也没有死去。

这是一个鬼魅横行的非常时期，又是一个龙蛇混杂的特殊时代；这是一个噤若寒蝉的非常时期，又是一个思绪激荡的特殊时代；这是一个可诅咒的非常时期，又是一个可歌可泣的特殊时代。军事上的灭绝人性，经济上的独裁垄断，文化上的法西斯高压，凡此种种，可以暂时遏抑武装抵抗和政治对抗，却无法扼杀文学上的创造与抗争——只要个体的心灵是自由的。可是，这世界上又有什力量能够禁锢心灵的自由，能够让一个伟大民族的灵魂屈服呢？在《欢迎胡适之先生》^②一文中，作家李道静这样反观刚刚逝去的沦陷时期：北平“人民受苦最深，损失也最重。大概因为北平是我国的文化古城，在这里日本对于我们文化的侵略也最积极。他们的意思自然是想奴化毒化我们的人民，但是收效却甚微。”这些曾置身

其中的人的感受，是真实可信的。不过，要想客观公允地认识那个时代的作家与文学，却需要拉开足够的距离。

日本侵略者投降后，沦陷时期未曾中断创作的留京作家们普遍认为，“北平沦陷期间文坛冷寂”，热切期待今后新文学的繁荣。^③然而一旦面对抗战胜利后的北京现实，又都发出这样的慨叹：与沦陷时期相比，北京的“文艺界反而加倍贫乏，一般写作者，或无处发表，或能发表而所得过微，以致不能继续挣扎执笔。”^④这只是物质方面的原因。还有更为严酷的精神方面的原因。诗人南星在1946年写道：

去年秋天，或者有人还记得，留在北平的人也都透过去一口气来了。而那一口气又似乎不应当透过来，于是那些人很快地就被迎头一棒打下去，让他们离开幻想认识了新的现实。他们从前可以偷偷地愤怒，偷偷地希望，到去年下半年他们才发现自己已经是被判了无期徒刑的囚徒。^⑤

这可能是在沦陷时期有过文学活动的人都曾遇到过的困境，当然也包括南星本人。同一年，在大后方从事8年抗战文化工作的天津作家王余杞返回天津后，对国统区的现况作了异常尖锐的公开批评：

敌人投降，我们接收。接收者就是胜利者。胜利的姿态以对于收复区的中国人为限。对日本人却不然，那是所谓的“宽大”。日本人仍然大模大样地极尽享受，我们若熟视之而无睹。似乎中国人向来有尊敬洋人的脾气，日本人虽然战败，到底仍是洋人，我们不加尊敬就会怪不好意思。至于中国人呢？则不在话下，一切都是“伪”，“伪”与“真”势不两立，谁叫他们不到后方去蹲上8年，蹲上8年便是资格，具有这资格便该享受伪字号的人的尊敬，一如自己的尊敬洋人的日本人一般。^⑥

在这种政治空气的笼罩下，自然很难实事求是地对沦陷区文人加以细致的甄别。华北沦陷区头号小说家袁犀的命运就很具代表性。

他于 1945 年 11 月离开北京后，上海还有报纸称他为应当捉拿归案的逃犯。然而离开国统区后，他也未能摆脱困境。在解放区，他被明令禁止用沦陷时期的笔名发表作品。在政治生活不正常的年代里，更是屡遭磨难，始终未能从背负的“伪满作家”十字架下解脱出来，直到 70 年代末才开始有了根本性的改变。这是个人的悲剧，还是时代的悲剧？抑或就是历史的必然？

时至今日，将近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终于拉开了得以客观审视那个非常时代所需的距离；加之适逢改革开放、政通人和的新时期，历史和所谓的“历史问题”已与当事人脱离了利害关系。于是，“沦陷时期北京文学 8 年”这项研究才得以开展；于是，就有了目前这样的研究结果。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沦陷时期北京文学的多维参照

中国人民在本世纪 30 和 40 年代进行的抗日战争，是中国现代史上可歌可泣的光辉篇章，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我们把本时期气象万千的中国文学置于世界反法西斯运动的背景下加以横向的比较和考察的时候，中国抗战文学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就会清晰地显现出来。

在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中，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文学无疑最为鲜明和集中。1941 年 6 月 22 日，德国法西斯入侵苏联，占领了苏联的大片国土，但德寇的军事占领并没能维持多久。时至 1943 年 2 月，在苏联红军取得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胜利之后，苏联的卫国战争实际上已进入胜利结束阶段。1944 年，苏联的沦陷区全部解放，并且把卫国战争转变为解放东欧的反法西斯战争。

苏联的国情不同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其他被侵略国家。德国法西斯悍然对苏联发动军事进攻的时候，苏联已经经过了 20 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强大的统一国家。外来入侵所引发的，是举国上下一致投入伟大的卫国战争。作家们也不例外。他们不但以自己的作品鼓舞、激励人民夺取最后胜利的意志，也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努力实践为祖国不惜牺牲生命的诺言。仅在战争爆发后的最初几天里，就有约 1 000 名文学家以战士、指挥员、政治工

作人员和记者的身分奔赴前线，有 400 多名作家在战场上壮烈牺牲。战争初期，最多的作品是政论、诗歌、特写和短篇小说。主题是迅速动员和团结人民群众反击侵略者，歌颂爱国主义和英勇献身的精神。随着战争的深入，逐步出现试图对现实进行全面概括的长篇抒情叙事诗以及中长篇小说和戏剧。它们或者反映前线的激烈战火，或者歌颂反法西斯斗争中的英雄和烈士，或者描写著名的保卫战，或者记述游击区人民的武装抵抗，或者表现沦陷区城乡人民的斗争和生活。也有一部分历史剧，再现了形成苏联以前俄罗斯等各国和各民族人民为自由和独立而光荣斗争的历史。可以这样说，卫国战争时期的苏联文学，继承和发扬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与人民和反侵略战争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具有高度的思想性和党性，全国人民始终保持着统一的明确目标。正因为如此，与俄苏文学有着不解之缘的中国抗战文艺工作者，在向中国人民介绍国外的反法西斯文学的时候，翻译得最多的是苏联的作品，如剧本《俄罗斯人》(西蒙诺夫著，梓鸣译)、《侵略》(李昂诺夫著，曹靖华译)，小说《虹》(瓦希列夫斯卡著，曹靖华译)、《复仇的火焰》(巴甫林科著，茅盾译)、《不朽的人民》(葛洛斯曼著，林凌译)等。这些作品对中国的抗战和抗战文艺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由于沦陷的时间很短，苏联没有形成独立的德寇占领区的文学。

欧洲有一些国家沦陷的时间比较长：德军于 1938 年入侵捷克、奥地利，1939 年入侵波兰，1940 年入侵比利时、丹麦、挪威、荷兰、卢森堡、罗马尼亚。在这些国家中，占主导地位的文学活动大多是移居国外的作家所创作的流亡文学，以及数量极少的国内地下反抗文学。例如，奥地利沦陷后，有的作家参加了反法西斯斗争，有的流亡国外，有的保持沉默，只是到战后，奥地利文学才得以重新发展。波兰被法西斯德国吞并后，文学创作主要由两个方面构成：一是流亡国外的作家的作品，一是在国内参加反侵略斗争的作家所办的少数地下刊物。真正形成了有世界影响的“沦陷时期文学”的，是纳粹德国占领下的法国。

1940 年 6 月，法国大部分地区被德军占领，成立了以法国人

贝当为头目的傀儡政权法国维希政府。沦陷初期，严厉的书报检查加上纸张缺乏、运输紧张，使得出版业几乎陷于停顿。一部分文化人逃亡国外，极少数人投靠侵略者，绝大多数作家则停止了写作。从1942年起，随着抵抗运动的蓬勃发展，地下报刊开始流传，但文艺作品在数量上不很大，读者主要还是阅读过去的作品。其中，最为著名的是转入地下的午夜出版社，出版了在法国人民中间广泛传播的“午夜丛书”。由于这些书籍不是公开发行的，以抵抗法西斯为主题的文艺作品得以出版问世。例如，曾入伍抗德的路易·阿拉贡（1897—1982），沦陷时期继续在国外出版作品，也在维希伪政权的报刊上发表一些较为隐晦的诗作。然而，他那气势磅礴，对战胜希特勒充满信心的著名长诗《蜡像馆》，却是于1943年由午夜出版社首次梓行的。与此同时，午夜出版社也出版了许多与抵抗主题无关的作品，原因只是作家们拒绝与伪政权的所谓的“合法”出版物发生联系。但是这并不影响午夜出版社在反纳粹斗争中所起的喉舌作用。最能体现这种与当局不合作精神的，是法国作家维尔高尓（1902—）的中篇小说《大海一般的沉默》。这篇作品于1942年由午夜出版社出版。小说描写德国占领军中一位彬彬有礼的军官，他不是法西斯分子，想和他的法国房东建立起友谊，但所面对的，却一直是房东一家人那“大海一般的沉默”。这样的主题，在当时法国抵抗运动中曾引起争议。但人们很快认识到，这是对现实生活的真实描写。它虽不是战斗的呐喊，但用沉默表达出了无声的，然而又是强有力的抗议。在征服与被征服的大背景之下，个体的良好愿望和品质无济于事。这个德国军官的带有悲剧色彩的际遇，使作品主题的意义显现出来。小说当时在法国广为流传，并且很快译成中文，对中国抗战时期的文学，特别是国统区文学有一定的影响。这部小说的主题很能说明法国沦陷区进步作家的著作和行为方式：无论是呐喊，还是为排遣寂寞和苦闷而进行写作和阅读，都尽可能不与德伪当局发生关系。

5年抵抗运动时期的地下文学，是法国对世界反法西斯文学所做的一个突出贡献。这与苏联迥然不同，也与中国相去甚远。中

国毕竟幅员辽阔，遭受侵略和反侵略斗争的历史更为长久、复杂，因而中国抗战文学必然会展现出空前的丰富多彩著称于世。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意义也确实逐步为国内国际学术界所认识。

1980年在法国巴黎召开的中国抗战文学国际座谈会，就是一个重要的标志。尽管有关中国抗战时期文学的探讨还不可能很全面，中国和外国作家学者所提交的论文，仍广泛涉及了反映“九一八”事变前夕东北人民的抗日激情和行动的东北文学，延安与八路军、新四军地区的抗战文学，大后方文学，以及抗战时期的沦陷区文学。在给大会的致词中，法国法兰西学院院士、司法部部长阿兰·佩雷菲特，以法国作家当时身受其苦的遭际和心态，来体验置身于抗战洪流中的中国作家的心境：“在占领的奴役下，在威胁的气氛中，作家被迫回转到自己的使命：写出具有持久性的作品。”^①并且认为：

对敌人占领的反抗，产生另一种更为基本的反抗，这就是作家对事物的时间与腐蚀的反抗。敌人的占领足以启示作家，因为作家是反抗性人物；在反抗中，存在着作家的自由。

佩雷菲特院士对于中国抗战文学的概括，是从狭义上理解的，即主要指以抗战为主题或题材的文学。这与人们当时对于中国沦陷区文学知之甚少不无关系。两年后出版的会议论文集《中国抗战文学法国座谈会论文汇编》清楚地显示出这一点。实际上，佩雷菲特的上述论断最符合沦陷区文学的情况，无论是对法国沦陷时期的文学来说，还是对中国的沦陷区文学来说，都是这样。

就在这一年，台湾最先出版了中国沦陷区文学研究的开拓之作《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史》（刘心皇）。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该书既没有从作品的实际出发，又缺少全面的分析和总体的把握，而只是根据种种表象，轻率地把活跃于当时文坛上的所有作者几乎悉数归入“投敌附伪的落水作家”之列。它的价值在于集中提供了一大批材料线索，尽管仍病于原始资料大多信手拈来，缺少辨析、剪裁，以及讹谬疏漏太多。

还是在这一年，美国的中国学家耿德华的《被冷落的缪斯——1937至1945年上海北京的中国文学》出版。这本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的专著成书于一个特殊的时代：作者既不能来大陆，也不能去台湾，只好局限在美国、香港和日本三地进行调查研究。因此，对当时的作家、作品、事件的描述不完整以及背景情况模糊等问题，便是在所难免的了，特别是北京部分。然而，由于坚持以文学作品为基础，他从并没有被归入“落水作家”的作者的作品中，发现了政治上的亲日反共之作，如耿小的的《敌?友?》；从“大东亚文学赏”入选作中，发现了“陈述因曲解西方思想而致使某些中国人软弱得不能抗日”的小说，如袁犀的《贝壳》。他所得出的种种结论，诸如“日本和它扶持的华北、华中伪政权所提倡的政治性文学全面破产”；中、法两国沦陷区在社会背景和文学背景方面都存在着差异，但“被占领的遭遇使这两种社会在文学上都取得了特别重要的成就”；等等，至今仍是成立的。

人们终于认识到，中国抗战时期的文学对世界反法西斯文学的贡献，不仅体现在轰轰烈烈的抗战文学中——早在抗战时期就先后有《中国抗战小说选》、《中国抗战诗选》、《中国抗战文艺选集》先后在英国、美国、匈牙利出版；而且也体现在长期被人们冷落的沦陷区文学中——尽管目前对其了解仍远未臻完备。

中国抗战时期文学的多样性，取决于共时并存的国统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沦陷区等不同的行政区划。仅就中国沦陷区而言，各沦陷区被占领的时间和社会形态也不相同。自16世纪下半叶以来，中国宝岛台湾屡遭东洋西洋列强的侵略，“马关条约”以后，被日本割据达半个世纪之久。1937年4月1日，台湾殖民当局明令废止中文，报刊只准用日文发行，9月份，又根据日本近卫内阁“国民精神总动员计划”，推行“皇民化运动”，妄图使“日本国民精神”“渗透到岛民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中去，以确实达到‘台内一如’的境地。”^②1931年“九一八”事变拉开了日本武装侵华和中国抗战的序幕，东北人民也开始了长达14年之久的亡国奴生活。次年，由日本炮制的伪满洲国出笼，企图借此将东北从中国的版图中永远分离。

出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日方在政治、军事、经济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文化方面，也加快侵略步伐，后来甚至丧心病狂地将日语定为“国语”，将中文称为“满文”，以“外文”对待，并廉价大量配销各种日文书刊，要求中国作家用日文写作，积极创造实施语言殖民化的条件。1937年爆发的“七七”事变，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开端。同时，在中国共产党和爱国军民的不懈努力下，中国也正式高举起全国武装抗战的大旗。由于国民党政府片面抗战和单纯防御战略的失误，华北、华东、华中、华南的大片国土接续沦丧。为了使日本在中国的占领区合法化，日本幕后操纵的伪政权机构纷纷成立：1937年11月22日，在张家口成立伪蒙疆联合委员会；12月14日，在北平成立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辖北平、天津及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的部分地区。1938年3月28日，在南京成立伪维新政府，辖江苏、浙江、安徽。1940年3月30日，伪国民政府成立，伪维新政府与其合流，北方的伪临时政府仍保持相对独立的特殊化地位，改称华北政务委员会。这充分表明，日本对中国，甚至对沦陷区，也是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此外，还有武汉、广州、海南岛、香港等沦陷区。在这么广大的沦陷区内，日本无力，也不可能有效实施文化和语言的殖民化，而中国的文艺活动却大多都曾有过在程度、规模和形式上不尽相同的发展。

总之，8年抗战时期，中国的既存军事、政治、经济体制是纷繁多元的，既有前线，也有后方，既有抗日民主根据地、国统区，也有沦陷区，在地城区划、人员等方面，则呈现变动、交错、重叠和交流的态势。而且，尽管有大片国土先后沦入日寇魔爪，但在国家的社会生活中，起主导作用的仍是国统区和抗日民主根据地。这些就是制约中国抗战时期文学发展格局的决定性因素。比如，以地城区划而言，国统区文学，是指在抗日战争的不同时期内，曾一度形成抗战文化中心的地区性文学。包括重庆、成都、昆明、贵阳、西安、乌鲁木齐、兰州以及沦陷前的上海、武汉、桂林和福建、广东等省的部分地区，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香港也包括在内。抗日民主根据地文学则包括延安和陕甘宁、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山东、华中等地区。

的文学。声名卓著的“孤岛文学”则是上海沦陷时期的一种极为独特的地域文学现象。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入日军之手。由于处在上海苏州河南岸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一直为英、美和法国控制，日本一时不便染指。于是，抗日文化活动奇迹般地得以继续开展。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向英、美、法诸国宣战后，日军才开进两租界，结束了依托这一隅所谓“中立”之地而坚持长达4年零1个月的“孤岛”时期。

以人员而言，“九一八”事变后，一批年青有为的东北作家陆续南下到达上海，以流亡者那带着刀光剑影和血雨腥风的雄浑作品，震撼了中国文坛，史称独领30年代中期风骚的“东北流亡者作家群”。“七七”事变后，平津、上海大批知名作家和学者奔赴抗日前线和后方，学术文化机构纷纷南迁，在内地的许多城镇形成了新的文化中心和文学运动的中心。而此时，一些不堪忍受台湾殖民文化高压的人士却不远万里移居北京。这时他们已被强加上日本国籍。对于日方来说，他们是日本向大陆占领区扩大移民的一个来源，而对于他们中的进步分子来说，北京则是他们躲开“大和文化”，重新回归中国文化的避居地。同样，随着东北文化界的法西斯统治不断强化，特别是1941年伪满国务院弘报处发布《艺文指导要纲》之后，进步作家遭到更加残酷的镇压和更加严密的监视，正常的文艺活动已无法开展。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坚持在伪满洲国从事创作的新老作家也陆续打通关系办“出国证”南下。不过，由于种种原因，这一次他们大多只能留在北京，但对于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说，这一步已使他们有了为“做一个中国人而自豪的情绪”。^⑧滞留北京的台湾作家群、东北作家群，特别是后者，在北京办刊物搞创作，为沦陷中后期北京文学的盛极一时发挥了重要作用。沦陷后期，北京又有一批人前往南京、上海谋生路，形成了所谓的“在首都的华北文化人”群体。另外，由于日本是侵略者，日本人员得以大量涌入，造成了沦陷区中日文化交接的畸形膨胀。

地区划的屡屡交替变迁，人员构成的频频更迭流动，无疑加速了地域文化乃至民族文化之间的接触、碰撞与整合。凡此种种，